

遵义会议研究的两个问题

李怀录

(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 陕西西安, 710068)

摘要: 朱德之所以没有参加遵义会议后成立的“新三人团”, 是毛泽东和当时的中央政治局从军事指挥、朱德和毛泽东关系以及党内团结的角度来考虑的结果。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 以前对周恩来的作用肯定不够, 事实上, 由于周恩来当时在党内、军内的地位, 其作用是无人能替代的。在遵义会议后, 周恩来对确立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也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关键词: 遵义会议; “新三人团”; 朱德; 周恩来; 毛泽东

中图分类号: K264.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09)01-0103-07

遵义会议是党历史上一次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会议, 多年来对之研究的文章和著述很多, 但仍有一些问题有待研究与补充。如朱德没参加“新三人团”的原因是什么, 周恩来对遵义会议成功召开的作用如何, 就有待解释与研究。

一、关于朱德没有参加“新三人团”的原因

军事斗争是长征中压倒一切的问题。军情多变, 复杂严峻, 军事指挥需要高度集权, 果断处之。而遵义会议后, 中央总负责的张闻天鉴于以前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缺乏民主, 独断专行, 故为加强民主, 常召集 20 多人中央会议, 对军事行动开会讨论, 集体决策, 懂与不懂军事的人都参加, 常为军事行动争论, 这样既牵扯了精力, 更与军情的瞬息万变相矛盾, 实际上又妨碍了军事指挥。特别是在 1935 年 3 月 10 日, 开会讨论是否打打鼓新场时, 唯毛泽东一人不主张打, 并以辞去“前敌总指挥的职务力争”, 在“少数服从多数, 不干就不干”的情形下, 毛泽东的意见被否定, 还失去了刚被任命不到一星期的前敌总指挥职务^{[1](143)}。后来事实证明, 毛泽东的意见是正确的, 还是毛泽东高明。此事后, 为适应军事斗争和指挥的需要, 毛泽东提议可继续采用长征初期的“最高三人团”的方式, 以加强和保证军事的集中指挥^{[1](135)[2](69)}。经过此事, 张闻天也认识到军事指挥需要临机决断, 经常开会来决定, 对军事指挥不利, 自己对打仗是外行,

成立“三人团”, 便于集中, 也省掉召集会议的麻烦^{[3](268)}。于是, 经张闻天同意, 报中央政治局批准, 1935 年 3 月 11 日左右, 在贵州鸭溪、苟坝附近成立了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领导小组”, 即“新三人团”, 全权负责军事指挥^{[4](227)}。

“新三人团”为什么是这样的人选? 而政治局委员、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特别是刚刚结束的遵义会议决定的最高军事指挥者两人之一的朱德却没进“新三人团”, 为什么? 多年来, 笔者一直存有疑问。名单是毛泽东提议的, 论地位、能力、资历及与毛泽东关系, 朱德都应是人选。有关遵义会议的文献资料或研究著述很多, 但对“新三人团”为什么是这样的人选, 朱德为什么没参加却未见有关解释和论述。在此, 笔者只能根据当时的情形, 以相关史料为背景, 予以大胆推测, 以求教于同仁。

(一) 从“新三人团”成立的目的看

从“新三人团”成立的背景看, 当时有两个目的。一是便于军事指挥集中专断, 故人不能太多; 二是为了保障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在当时形势下, 周、毛、王三人组合是最合理组合, 能实现这两个目的。“新三人团”成立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保证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 三人中, 毛泽东自不必说。就周恩来而言, 周恩来和朱德是遵义会议决定的军事指挥者, 特别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最后决心的负责人”^{[5](42)}, 又兼红军总政委(当时红军中政委高于司令), 不管是在党内还是在红军中都有深远的影响和很高的权威性。加之周恩来为人谦和、灵活、易相处, 能在红军

高级指挥员及党中央的同志中间起到一种特殊的纽带作用。周恩来在遵义会议前后,就对毛泽东予以极大的信赖和坚定的支持,在“新三人团”中自然也会全力支持毛泽东。以周恩来的地位、权力、影响、能力,周参加“新三人团”必不可少。而选王稼祥,不仅仅因为王是毛泽东的支持者,还有更为重要的考虑。一是从策略上可以团结“留苏派”。当时中央留苏归来人员占有很大比例,掌握着实权,是“主流派”,遵义会议解决的只是最为迫切的军事路线和领导的局部调整,而组织路线正如周恩来所指出的“并没有完全解决”,或者说“是勉强解决了”^{[6](13)}。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没有时间也不可能当时就解决,即使军事路线在遵义会议上也曾展开激烈的争论和辩论。当时博古“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则更是“完全坚决的不同意对他的批评”^{[5](42)}。遵义会议后,“教条宗派主义者并不服气,暗中还有不少活动”^{[7](258)}。凯丰参加遵义会议回去后就说:“谁正确,谁错误,走着瞧吧!”^{[8](33)}当时,“留苏派”还是一个“整体”,无论是从政治上考虑,还是从军事上考虑,都需要团结“留苏派”,需要他们的支持。张闻天接替博古在中央负总责,是“留苏派”内部人员的变动,“留苏派”是接受的。如果在当时最重要的军事问题上,不让“留苏派”人员参加军事领导,“留苏派”就不易接受了。这对毛泽东的支持者和非支持者都是一种打击,反而不利于军事指挥和保证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遵义会议不讨论政治路线,毛泽东承认一个不正确的、自己不认同的路线,也是时机不成熟,情势所然,否则就无法与张闻天等联合,不能与“留苏派”联合^{[1](78)}。王稼祥是从“左”的阵营分离出来的“留苏派”人员,让王稼祥参加军事领导,作为“留苏派”代表,就可以团结“留苏派”群体,赢得一大批人的支持,避免思想上的分歧、内部的矛盾影响到军事指挥。这体现了毛泽东的一种高超的斗争策略和大局观念。二是毛泽东可获得强有力的支持。毛泽东虽在遵义会议上当选为常委,许多人对毛泽东的军事指挥并不了解,对其军事才能信任也不足,常委分工时,只是让毛泽东充当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手。毛泽东要充分发挥自己军事才干,实践自己的军事思想,需要强有力的支持。但当时,毛泽东获得的支持还不够。“一些领导同志对毛泽东走打结合、避实击虚的高度机动的运动战方针不理解”^{[9](155)}。打鼓新场争论也说明一些领导对毛泽东的信任“还是不坚定的”^{[1](143)}。在这种情形下,王稼祥参加“新三人团”,对毛泽东就可获得强有力的支持。除了团结“留苏派”

外,王稼祥以前就是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遵义会议增选为政治局委员(前为候补委员),本身是长征中毛泽东的坚定支持者。这时,长征途中形成的“中央队三人团”中,张闻天已在中央负总责,王稼祥再进入“新三人团”就更加加强了支持毛泽东的力量。三是可以解决毛泽东与王稼祥的矛盾。王稼祥在根本上是全力支持毛泽东的,但对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战略战术原则并不完全理解。在毛泽东就任前敌总指挥后,王稼祥对其指挥“发些议论,经常要求中央开会,讨论军事行动”^{[3](267)}。在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主持召开过几次这样的会议。经过打鼓新场事件后,张闻天认识到这样会妨碍军事指挥,就很赞成毛泽东成立“三人团”的建议,希望通过“三人团”使“毛王之间的矛盾可以由他们自己解决”而不影响军事决策^{[3](268)}。毛、王的矛盾只是军事指挥上的具体问题上的矛盾,在一起只要加强交流沟通,增强理解,就可解决,从而有利于军事指挥。因此,在人员受限的情况下,“新三人团”人选很重要,如让朱德参加“新三人团”,那只是单纯的军事观点,而不是政治观点,不如王稼祥参加更有利于军事指挥。所以,毛泽东没提议朱德。可以说,周、毛、王组合是当时最佳的人员搭配结构。

(二) 从毛泽东与朱德的关系方面看

毛、朱的一致与分歧势必影响到特定背景下的人选问题。毛泽东与朱德多年共事,两人思想一致,尤其是战略战术思想一致,毛泽东可以代表朱德。在人员受限的情况下,从全局角度出发,不需两人都要进入。何况朱德性情宽厚,在党内向来不计较个人名利地位,不进入并不影响其威望,更不会妨碍军事指挥。但另一方面,也应看到,毛泽东与朱德的这种一致性只是总体而言,并非在具体问题,具体军事指挥上完全一致。事实上,两人很正常的存在着一些非根本性的分歧。不说两人过去的分歧矛盾,但就长征时而言,朱德身为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是重要的军事领导人,在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一直执行的是“左”倾军事路线,对失败虽不负主要责任,但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发言中就尖锐批评了军委工作^{[10](82)}。在讨论是否打打鼓新场时,作为遵义会议确定的负责军事指挥的朱德与毛泽东主张显然相左^{[1](143)}。这本属正常,但对毛泽东而言,就可能相当严重,非同一般,不能不影响到毛泽东的人选决定。我们以往研究历史人物活动,常常只注重其社会性、历史性,而忽视其个性的一面。事实上,许多情况,人的个性因素作用很大,甚至是决定性因素。毛泽东是伟人,但他首先是个活生生的常人,有其喜怒哀乐。在这件事上,以毛泽东的个性,在毛泽东看来,朱德

与自己多年共事，相知很深，却也不支持他，在心理和感情上受到的打击就不同于其他人的反对意见的打击，毛泽东自然就不能坦然地接受之。现在需要集权，需要保证指挥权，在人选上，不提议朱德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所以，无论是从朱毛一体不分家，还是朱毛有间隙来说，毛泽东不提议朱德参与“新三人团”都是正常的。既然名单没上，朱德自然就没参加“新三人团”。研究历史问题，我们需要克服一种陋习，即讲正面人物关系，只讲和谐一面，而忌谈矛盾与分歧，似乎这是污点，这是不客观的，势必影响具体问题的分析与认识。

（三）从“新三人团”的性质看

“新三人团”是党的临时军事决策和指挥机构，不是军事行政领导机构，军事领导人员不一定非得参加。遵义会议决定，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实际上是在中央领导下，分工负责军事工作，朱德是军事行政领导，周恩来是政治领导。“新三人团”是党的军事领导机构，朱德作为军事行政领导可参加，也可不参加，参加并不具有必然性。在二三十年代，由党成立机构或直接派人领导军事是正常现象，军事领导人一般处于从属地位，有时不参加，这都是正常的。事实上，朱德的许多职务主要是军事行政职务，这与周、毛的参加是不同的。在党内常委分工中，周、毛负责军事。周是“党内委托最后下决心者”，毛是周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二人必然要参加“新三人团”。让王稼祥参加“新三人团”，也主要是从政治领导角度考虑的。这在第一点已分析。

另外，会不会有别的原因，如朱德谦让推辞，或朱德正在前线指挥战斗，不能参加等。这些说法的可能性或许有，但至今没见到有关史料证明，同时，笔者以为，这也从常理上说不过去。先说第一种可能性。人员是毛泽东提议、张闻天同意、经政治局批准的，人员名单本身就未朱德名字，朱德何来谦让推辞？再看第二种可能性。首先，朱德作为最高军事行政领导人，是随中央行军的，军委的命令随时需要签发，一般情况下，总司令、军委主席是不直接上前线的，当时至少不是非常时刻；其次，当时多次召开的会议朱德都参加了，至少促使新三人团成立的关于是否要打鼓新场的会议是参加了，从时间看，政治局开会讨论批准“新三人团”时，朱德应是与会者，当时不在前线；再者，即使是在前线，也可通知参加或在中央决定后，发电通知参加新三人团；最后，新三人团也并不需要三人时时在一起，即使是常在前线也并不影响军事决策指挥，相反更便于决策指挥，等等。这些说明朱德在前线就无法参加新三人团是站不住脚的。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以为，“新三人团”人选是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基于当时形势，全盘考虑后确定的，故朱德没有参加“新三人团”。

二、关于周恩来对遵义会议成功召开的作用

遵义会议是党在生死存亡关头召开的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会议，实现了由“左”倾错误向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的转变。这次会议之所以能顺利举行并成功召开，实现转折，就个人作用而言，周恩来在遵义会议前后起了关键性作用。过去，更多地强调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人的作用，而对周恩来所起的作用肯定不够，这是不恰当的。

（一）周恩来与“左”的阵营分离，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物质基础

遵义会议能如愿召开，成功召开，与周恩来此前思想和行动的转变密切相关。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的严重挫折，使许多人对“左”倾领导产生了怀疑和不满，思想认识在悄悄变化。与此同时，反对博古、李德的力量也发展起来。长征开始以后，张闻天、王稼祥、毛泽东在中央公开反对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也取得了许多人的理解与支持。周恩来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员。在长征初期，周恩来作为“最高三人团”成员之一，实际上执行的是一条“左”倾路线。但残酷的事实，撕碎了他的迷信，使他痛惜之余，开始反省这条路线是否正确。在党和红军的生死存亡关头，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愧疚感，促使他开始从根本上开始考虑党和军队的方向问题、领导问题，有了要纠正错误，改变领导的想法。当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联合起来在中央与博古、李德公开争论开始后，周恩来就逐渐与“左”的阵营分离，转向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长征出发时干部的去留问题掌握上是很严格的。“高级干部，则一律由最高‘三人团’决定”^{[1](78)}。实际上是由博古、李德决定。谁走谁留对个人以后的命运关系极大，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点。本来，毛泽东是被决定不帶走的，决定派他去零都搞调查研究，是周恩来、朱德等人一再坚持，才被允许一起转移^{[10](39)}。这看来是件孤立的事情，但它为后来毛泽东在危急关头发挥作用创造了前提，也为毛泽东争取到张闻天、王稼祥的支持和在遵义会议上发挥作用创造了条件，从而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准备了前提条件。

长征初期，红军损失惨重，湘江战役后，红军从出发时的8.6万多人减到3万多人，而且国民党已判

明红军行动方向,正布下重兵,张网以待。在危急关头,早被剥夺权力的毛泽东向中央建议放弃北上,转道贵州。毛泽东的这一建议,立即得到了周恩来、洛甫和王稼祥的支持^{[9](125)}。1934年12月12日,中央在通道召开非常会议,毛泽东关于改道的主张得到多数人赞同,红军行动路线有所变化。13日,红军突然转道贵州,暂时脱离险境。这须归功于最高“三人团”中负责督促军事行动落实的周恩来。短促的通道会议,是红军战略方向转变的开始,也是纠正“左”倾军事路线的开始。周恩来对毛泽东主张给予坚决支持,不再盲目服从李德的指挥。博古、李德的战略方针和权威第一次受到挑战。李德在事后回忆说,“当我看到所发布命令时,我才知道了最后决定的全部内容。我请周恩来给我讲一讲详细情况,他显得有些激动,虽然他经常总是很镇定自若的。他说,中央红军需要休整,很可能在贵州进行,因为那里敌人的兵力比较薄弱。”^{[9](125)}但通道会议“未能说服李德等人”,因而中央军委未做出“转兵”的正式决定,博古、李德仍坚持北出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12月18日,中央又召开黎平政治局会议讨论战略方向。会上以毛泽东代表的意见与李德代表的意见“争论激烈”。“李德什么人的意见都听不进去”,一向组织性强,镇定沉稳的周恩来也“发脾气了”。最后,主持会议的周恩来采纳了毛泽东到川黔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主张,否定了博古、李德的主张,会议正式做出转兵的决定。周恩来回忆说:“我决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见,循二方面军原路西进,渡乌江北上。”^{[2](64)}黎平会议,毛泽东的主张被采纳,是与“左”倾路线斗争的胜利,为以后遵义会议纠正“左”倾军事路线打下了基础。会议还决定在适当时间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总结反围剿经验教训,这为以后遵义会议召开埋下了伏笔。黎平转兵是一个关系中央红军命运的重要转折点,没有这个转折,遵义会议是不能胜利召开的。“李德因争论失败大怒”,会后,与周恩来大吵了一场。从此,周恩来与李德发生分歧,他们关系开始疏远。周恩来“对军事错误开始有些认识,军事指挥与以前也不同,接受毛主席的意见,对前方只指出大方向,使能机动”,“与博古的态度有区别”^{[2](64)}。黎平会议虽正式做出转兵决定,并对博古、李德进行了批评说服,但他们顽固不化,固执己见,红军的战略方针仍处在争执中。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又在猴场召开会议,周恩来主持会议,再次否定博古、李德的错误意见,重申了黎平会议的主张,巩固了黎平会议的胜利,进一步批判了“左”倾错误。会议还专门做出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

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11](446)}这实际上取消了李德独断专行的权力,改正了最高“三人团”凌驾于政治局之上的不正常状态,恢复了党对军队的正常领导。这是组织上取得的重大胜利。通过三次会议否定了博古、李德的错误战略方针,采纳了毛泽东的主张,解决了迫在眉睫的、至关重要的部队行动方向问题,最终实现了转兵,避免了中央红军覆灭的危险。

这三次会议,周恩来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周恩来当时作为中央常委、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三人团成员之一,在党内军内地位和权力仅次于博古。他是否坚定地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反对李德、博古的错误领导,对于尽快结束“左”倾军事路线,避免中央红军的覆灭,重新确立毛泽东对党和红军的领导关系极大。当时,李德指挥处处碰壁,三人团指挥受到挑战,能够排除李德的指挥和干扰,向全军发布命令的只能是周恩来,这是早已罢官的毛泽东、长征前被排挤出核心领导层的张闻天和王稼祥等都替代不了的客观现实。正如贺子珍回忆:“毛泽东在长征路上给中央提出的很多建议,都是同周恩来谈的。他建议中央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把红军队伍拉到贵州,也是先得到周恩来的同意,并通过周恩来去实行的。”^{[12](194)}张闻天当年曾把中央纵队“三人团”比作是为遵义会议的召开提供了物质基础,无疑周恩来与“左”的阵营决裂也是如此。在党内军内反对博古、李德的力量发展的时候,他与“左”的阵营分离,从根本上增强了正确意见的力量,使双方力量的消长,朝着有利于反对“左”倾错误的方面发展。这就使博古、李德的权威受到挑战,权力被极大削弱,再也不能象以前那样发号施令、独断专行了。“左”倾错误受到批评、抑制,得到一定程度地纠正,斗争的筹码倒向了正确的一方。人们对“左”倾错误认识上的提高,斗争双方力量的消长,就从思想上和组织上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作了准备,奠定了“历史转折”的物质基础。1972年6月10日,周恩来在回顾这段党的历史时说:“经过不断斗争,在遵义会议前夜,就排除了李德,不让李德指挥作战。这样就开好了遵义会议。”^{[2](66)}

(二) 在遵义会议举行和召开中,周恩来起了无人替代的作用

遵义会议是王稼祥与毛泽东商量后倡议召开的,但离开了周恩来的支持则不可能顺利举行。以周恩来当时所处的地位,他的立场和态度是这次会议能否召开的关键因素。当时,博古、李德因军事上连遭败绩,灰心丧气,威信扫地,已无法象以前那样发号施令了。而周恩来在党内,地位仅次于博古,经过此前的几次会议已是实际的军事负责人,其威望远远超过博古、

李德。张闻天在党内地位虽高，但被排除在核心领导层之外，没有实权，毛泽东也只是刚刚有了发言权。因此，实际上是他肩负着领导全党全军度过那段艰难局面的重任，是无形中的最高领导人，只有周恩来才能决定是否开会，开什么会，召集哪些人参加。所以，毛、王商议后，先去征求周恩来的意见。得到周恩来的同意后，又得到其它人的支持，这才召开了遵义会议。

周恩来不仅支持了会议的召开，而且筹备了会议的召开。1935年1月9日，周恩来进入遵义城，立即布置总部参谋人员打扫贵州军阀柏辉章住宅。为准备遵义会议报告，“会前，博古、周恩来同志都从作战科要了一些敌我双方的资料与统计数字”^{[13][174]}，周恩来将这些资料进行认真分析研究，从中总结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在军事指挥上的战略战术上所犯的 error 和得失。为准备开会，他通宵达旦地工作。据贺子珍回忆：“第二天，听到周恩来的警卫员说，周副主席为了准备这次会熬了个通宵。”^{[12][194]}1月13日24时，周恩来发电报通知刘少奇、李卓然：“十五日开政治局会议，你们应于明十四日赶来遵义城参加会议。”^{[14][423]}这份电报是判断遵义会议召开时间的最好依据。周恩来对会议的关注和为此所作的努力，反映了他希望尽快结束这种不正常局面的心情。

1935年1月15~17日，遵义会议召开。遵义会议是政治局扩大会议，与会者还包括红军和一些部门的领导人。会上，博古代表政治局作了第五次反围剿的报告，侧重从客观方面上为军事失败辩解，不承认是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接着，周恩来代表军委作报告，与博古观点相左，侧重从主观上指出军事指挥的错误，并主动承担了责任，做了自我批评。周恩来在遵义会议上作自我批评，起了特殊的作用。一是批判了“左”倾错误，促进了遵义会议对“左”倾路线的纠正。“博古把重点放在客观因素上，周恩来则放在主观因素上”^{[9][132]}。两个报告唱反调。周的报告实际上是从书面上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为其他人的批判发言开了个好头。“三人团”成员都在互相批评，别人就更不用有什么顾虑了。随后，张闻天、毛泽东等相继开始发言，批判“左”倾错误及其军事路线。二是对最高“三人团”产生了分化作用，促使了最高“三人团”的解体。遵义会议开得相当激烈，会前、会中，批判者与被批判者双方都积极活动，争取同盟者。如果说此前，周恩来的态度不明朗的话，这个报告就公开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公然反对博古、李德。李德在自己的书中写道说：“博古把重点放在客观因素上，周恩来则放在主观因素上，而且他已经明显地把

自己同博古和我划清了界限……果然不出所料，周恩来公开地倒向毛泽东。”^{[9][132][30]}周的态度也对博古、李德产生了分化作用。李德虽然“完全坚决的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但周恩来的态度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博古，博古虽然最终仍保留意见，但也不得不承认在个别战略和战术决策上有错误。“最高三人团”的解体，就推动会议对组织问题做出调整，产生新的领导机构。三是促成毛泽东在党同军内领导地位的初步确立。在张闻天作“反报告”和毛泽东作长篇发言后，周恩来再次发言，明确表态支持张闻天的“反报告”，强调只有改变错误的领导，红军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他竭力推举毛泽东领导红军今后的行动，他的倡议得到与会多数人的赞同和支持^{[15][117]}。这对会议确立毛泽东党内军内的地位起了关键性作用。当时，“最高三人团”仍存在，博古、李德虽威信扫地，但组织上、名义上仍拥有最高权力；毛泽东过去只是地方领导人，没在中央核心层任职，许多人对他不熟悉（张闻天对毛泽东的真正接触也只是从苏维埃政府开始，长征途中才加深了解），对红军的领导从1931年的赣南会议后就已经被取消，长期受排斥，党内境况很差。在党内，要改换领导，担任重要领导，首先必须有人提议，提议者应当在党内任要职、有地位、有影响、有威望，在当时情况下，周恩来的倡议就比其它人的提议更有分量，更易为人所接受，这就为撤消“最高三人团”，取消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选毛泽东为常委并参与军事指挥起了促成作用。历史已证明，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从遵义会议开始，从周恩来开始。遵义会议上，周恩来的作用无人替代。

遵义会议共开了三天，最后，会议做出决定：“（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人。”^{[5][42]}众所周知，遵义会议开得相当成功，达到了目的，纠正了“左”倾军事路线，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

（三）遵义会议后，周恩来对确立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遵义会议是实现党的领导从错误走向正确的转折，形成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军队中的领导地位。但我们应清楚，实现转折，不是以遵义会议为分界点嘎然而成的，实际上，是以遵义会议为转折点，在贯彻遵义会议精神的过程中实现的。在这期间，周恩来起到了承前启后的

作用,为确立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做出了更大的努力和贡献。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虽说已是常委,回到了军事领导岗位,但在常委分工中,党中央负总责的是张闻天,负责军事的是周恩来。毛泽东还只是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即使“新三人团”成立,也是周恩来为“团长”。无论是职务,还是实际作用,毛泽东当时都不是党和军队的最高领导人。许多人论证说,长征中军事工作压倒一切,“新三人团”是最重要的领导机构,“新三人团”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成立就标志毛泽东成了最高领导人,这种说法显然牵强附会太多。“新三人团”只是党领导下的军事指挥机构,它再重要也不可能超越党中央和政治局之上,这是与旧“三人团”根本不同的。“新三人团”是以周恩来为中心的。这与1967年毛泽东的一次谈话中所说相符。毛说“后来搞了个三人团,团长是周恩来,团员一个是我,一个是王稼祥。”^{[3](269)}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时,一向非常严谨的周恩来,在一次讲话中谈到“新三人团”时,却只是说“成立一个几人的小组,由毛主席、稼祥和我,三人小组指挥作战”,而并没有说这个三人小组是以毛泽东为首的^{[2](69)}。在四十年代,人们对遵义会议的评价,尤其是对毛泽东领导地位的评价,显然有了太多的人为因素影响,一些说法有失客观。

实际情况是,遵义会议后一段时间,毛泽东的领导没有立即被大家完全接受,毛泽东的军事指挥及其军事思想的运用受到很大制约。许多同志对毛泽东的军事指挥,还抱着各种不同态度。有不服气者,据李维汉回忆,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参加遵义会议回去后就说:“谁正确,谁错误,走着瞧吧!”^[8]聂荣臻在回忆中也说,“遵义会议以后,教条宗派主义者们并不服气,暗中还有不少活动。忽然流传说毛泽东同志指挥也不行了,要求撤换领导。”^{[7](258)}有怀疑者,据张闻天说,当毛泽东1935年3月初就任前敌政治委员去前方指挥作战后,对于毛泽东的指挥在中央领导人中即有一些不同议论,“经常要求中央开会”,打鼓新场战役问题的争论反映了当时对毛泽东的信任“还是不定定的”^{[1](143)}。有不理解、不认同者。当时,许多人对毛泽东走打结合、避实击虚、高度机动的运动战方针不理解。如四渡赤水,毛泽东说这是他一生的得意之作,但当时却因为不理解发生了一场反对毛泽东指挥的风波。四渡赤水时,为迷惑敌人,部队经常转移,忽左忽右,忽前忽后,迂回曲折,走‘之’字路,拖垮敌人的同时,也使红军疲惫不堪,士气不高,部队产生普遍的不满情绪。据杨尚昆回忆:“那时候迂回

曲折走得很苦,两条腿都走痛了,有的人连爬都爬不动了。这段时间,红军的情绪是不高的,四渡赤水,今天过去,明天过来,部队里骂娘骂得很厉害。”^{[16](4)}一些遵义会议上毛泽东的支持者也对毛的指挥有一些不同看法。约在4月中旬,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刘少奇、政委杨尚昆联名给中央军委发了一个电报,反映部队情绪,谈了自己的不同看法^{[17](198)}。“新三人团”中的王稼祥也向张闻天反映,老打圈圈不打仗,可不是办法^{[1](143)}。反对意见最突出的是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他公开否定毛泽东对红军的指挥,认为“尽走弓背”,“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像他这样领导指挥还行!?”4月下旬,林彪直接写信给中央,要求撤换毛泽东,由彭德怀出来指挥红军。这“在中央红军领导层中,泛起一股小小的风潮”^{[7](259)}。为了统一思想,5月12日,中共中央在会理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了林彪要求撤换毛泽东的错误意见,也批评了其他几位同志,肯定了毛泽东这一时期的军事指挥,维护了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上述情况说明,遵义会议后的一段时间里,许多同志对毛泽东的指挥还抱着怀疑的态度,还没有完全接受他的领导。毛泽东同志对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还没确立起来。李德在《中国纪事》中谈到:“毛(泽东)在遵义的‘胜利’并不是像我当时所感到的那样完美,他在政治局的统治也不是那么巩固。”^{[9](141)}

在其它人对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有各种各样想法、持不同态度时,作为军事负责人的周恩来却给予毛泽东以坚定的信任和坚决的支持。毛泽东复出后指挥的第一仗战斗——土城战斗失利,威信大受打击。3月10日,在讨论是否打打鼓新场时,在“少数服从多数,不干就不干”的情况下,毛泽东的意见没被接受,当晚,毛泽东又夜访周恩来,陈述利害。周恩来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第二天又说服其他人,改发了命令^{[2](69)}。从这件事可看出,周恩来对军事指挥拥有最后决策权,对毛泽东的信任比其它人更坚定。此事之后,为了集中指挥军事,中央决定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新三人团”,全权负责军事。周为“团长”,却全力支持毛泽东,自觉地当起了“参谋长”,使毛泽东能尽显军事才华。这才有了四渡赤水及后来一系列军事胜利,使红军摆脱了国民党的围追堵截,取得战略转移的主动权。对毛泽东的战略战术,许多人不理解,但周恩来却充分理解。针对当时反对毛泽东指挥的风波,他坚决支持毛泽东,批评了林彪,赞扬毛泽东的军事领导艺术。说在敌人前堵后追的危急情况下,采用兜圈子的办法,四渡赤水,再进遵义,甩掉了敌人,胜利渡过了金沙江,就是最好的例证。在他支持

下，毛泽东在运动战中摆脱重兵包围的战略被确认，从而使毛泽东对军队的领导得到进一步巩固，也使毛泽东在党内军队内的地位不断上升。同时，权力也在毛、周之间发生着微妙的变化，重要问题大都是毛泽东出主意，周恩来同意，并负责落实。周恩来虽仍是党内军事方面的总负责人，但毛泽东已成为军事指挥上实际的主要决策者。自此，毛泽东对党和红军的领导再也没动摇，这为毛泽东在长征后期一系列问题上发挥作用提供了坚实的平台。这一切自然都离不开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充分信任与坚决支持。

四方面军会师后，发生张国焘向中央要权的事情，他“要当总政委”，“不要总书记”^{[17](202)}。为了红军的统一和党的团结，在7月18日召开的政治局芦花会议上，周恩来让出红军总政治委员职务，由张国焘担任^{[18](585)}。周恩来调中央常委工作，仍是中央负责军事的常委。8月19日，在沙窝，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会，研究常委分工。周恩来因积劳成疾，昏迷不醒，中央才决定由毛泽东接替周恩来分工“负责军事”。这时毛泽东才成为军事最高领导人^{[10](189)}。以后，到延安又经过一段时间的过渡，毛泽东才逐渐成为名符其实的党和军队最高领导人。在遵义会议召开后的这段过渡时期，周恩来起了承前启后作用，最终确立了毛泽东对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 张闻天·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C]//遵义会议文献.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5.

- [2]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 周恩来·党的历史教训[C]//遵义会议文献.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 [3] 程中原. 张闻天传[M].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
- [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周恩来年谱(1898-1949)[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89.
- [5]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 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C]//遵义会议文献.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 [6] 周恩来. 历史的教训(节录)[J]. 党史通讯，1985，(1)：13-14.
- [7] 聂荣臻. 聂荣臻回忆录·上册[M].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3.
- [8] 李维汉. 回忆长征[J]. 党史通讯，1985，(1)：29-35.
- [9] 李德. 中国纪事(1932-1939)[M]. 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
- [10]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红军长征史[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万卷出版公司，2006.
- [11]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 [12] 王行娟. 贺子珍的路[M]. 北京：作家出版社，1985.
- [13] 吕黎平. 青春的步履[M].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4.
- [14] 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 周恩来致李卓然、刘少奇的电报(1935年1月13日)[C]//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5册. 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83.
- [15]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 伍修权·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回忆遵义会议的前前后后[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 [16] 杨尚昆. 对毛主席的几点回忆[J]. 文献和研究，1987，(2)：2-5.
- [17] 彭德怀. 彭德怀自述[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 [18]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 红军长征·文献[M].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5.

Two topics at Zunyi conference

LI Huailu

(Xi'an Politic Institute of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Xi'an 710068, China)

Abstract: The reason why Zhu De didn't join "New Three-Person Corp" is the consideration of military command, relationship of Zhu De and Mao Zedong and unity inside party. Due to Zhou Enlai's status in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Red Army, he brings into play an irreplaceable role in success at Zunyi conference. After the conference, Zhou Enlai acts as a link between the past and the future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Mao Zedong's leading position in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Red Army.

Key Words: Zunyi conference; New three-person-corp; Zhu De; Zhou Enlai; Mao Zedong

[编辑：颜关明]